

中国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与伦理行为关系研究

伍如昕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以 CGSS(2010)中的城市居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考察了社会地位及其实际损益和预期损益对中国城市居民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国情境下, 高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比低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更多实施伦理行为; 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实际损益与伦理行为存在负相关, 现有社会地位上升的个体更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 而现有社会地位下降的个体则更多表现出伦理行为; 预期个体社会地位提升的城市居民比预期社会地位下降的城市居民更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

关键词: 社会地位; 地位变迁; 伦理行为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2-0138-07

一、引言

公民伦理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是国家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 同时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更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公民个体伦理道德素养、均衡的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是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伦理环境。然而,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的伦理道德状况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的趋势。为进一步加强公民伦理道德建设, 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修养, 迫切需要识别影响公民伦理道德的影响因素, 挖掘核心影响因素对公民伦理道德的微观作用机制。

以往的研究探讨了许多与伦理行为有关或对伦理行为存在影响的个体和情境因素, 包括性别、年龄、人格特征、道德意识、道德认同、道德脱离、决策框架、道德哲学、伦理领导、同伴群体、伦理氛围、文化、报酬和惩罚、伦理制度、情境的道德强度等^[1-2], 但却较少将社会地位考虑在内。所谓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所界定的社会位置或在一个社会等级体系或分层系统中的等级位置^[3], 它常用来表示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程度, 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国外现有少量关注社会地位与

伦理道德的研究指出, 高社会阶层的人们更少表现出慷慨、慈善和亲社会行为, 因为他们缺少同情心^[4], 他们更容易欺骗、说谎, 或从别人那里夺取物品以丰富他们自己的物质成果^[5]。上层阶级表现出更多的内部倾向归因, 更少的移情准确率, 而且更以自我为中心等等, 这些会使得他们表现出更少的伦理行为。^[6]

诚如 Trautmann、Kuilen、Zeckhawser 所言: “阶层和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一个简单的模式而是一个复杂的马赛克。”^[6]在重视身份地位的中国社会, 社会地位又是否会对个体的伦理行为产生影响? 重视身份地位、面子荣誉的中国人是否会同国外研究所揭示的那样, 地位越高, 越少表现出伦理行为? 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得失的考量是否会影响到伦理行为的产生? 其是否会符合前景理论^[7]的预测, 即较之获得地位的提升个体更愿意为避免地位下降做出非伦理行为? 本研究希望借助我国大规模的经验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挖掘中国情境下, 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现状及其地位损益对个体伦理行为的影响, 寻找可能影响个体伦理行为的新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地位是个体在基于某种声望测量的社会系统下的相对价值。^[8]有关社会地位的研究可分为客观社会地

收稿日期: 2015-11-15; 修回日期: 2016-03-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企业新生代员工工作场所非伦理行为的形成与扩散机制研究”(13YJCZH20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工作价值观、潜规则对企业新生代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15YBA388)

作者简介: 伍如昕(1983-), 女, 湖南衡阳人, 管理学博士,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行为决策

位与主观社会地位两种不同路径。^[9]在客观社会地位的研究中，常将垂直地位、报酬、具体的额外津贴和社会尊重等作为表征地位的典型指标，或将社会地位表征为包含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以及职业地位等反映个人社会处境状况的综合指标。^[10-11]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则是指对自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综合评价，包括主观阶层认同或主观分层亦称“阶层归属感”。^[12]本研究从主观社会地位入手，考察我国城市居民以阶层为基础的社会地位认同及其损益感知对个体伦理行为的影响。由于人的社会性，人们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及相应的变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可能会影响人们的伦理决策和行为。“所谓伦理决策是指一种对更大的团体而言是合法和道德上可接受的决策。相反的，非伦理决策则是指在更大的团体看来非法并且在道德上不能被接受的决策”^[13]，就伦理行为而言，按照 Rest 的分类框架，其属于伦理决策的最后阶段^[14]。由于不同个体不仅仅以各自主观观念将社会划分为地位高低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将自己归入到相应的社会阶层中去；还在客观事实上与自己同处于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群体有着相似的职业权利、收入及财富水平、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乃至公民、公德意识。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可能有不同的公民、公德意识，而公民、公德意识又与个体的伦理行为密切相关，因此预计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的伦理行为。

然而，目前有关社会地位与伦理行为的研究还极为少见。Galperin、Bennett、Aquino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了用以解释高社会地位的组织成员卷入非伦理行为的理论模型。该研究将地位差异性定义为与组织提供的资源有关的地位，如报酬、额外津贴和声誉等分配的不公平。他们认为组织中的状态差异会导致社会孤立，从而激发高地位组织同一性，同时弱化道德同一性。其进一步指出高社会地位群体同一性会导致对群体外成员需求的不敏感，这反过来会导致更少的自我约束的伦理决策动机。结果使得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会更加愿意卷入非伦理行动。^[15]但这一情形在中国可能会有所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层级化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有所提高，但各阶层的边界仍然较为明显。加上国人有着强烈的面子观念，对于那些处于较高社会阶层，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可能会为了保存社会威望和荣誉，保留面子，因而以伦理的方式行为。而根据 Cohen 的地位剥夺及偏差副文化理论所言，在传统社会中，低阶层的人们

是受到歧视的，当低阶层的人们感到无法获得地位时，就会产生地位剥夺挫折反应，其结果就会产生偏差行为。^[16]因此，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社会地位偏低的个体则可能会为了生存，或因为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而做出一些功利性或报复性的非伦理行为。综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中国情境下，高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比低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会更少做出非伦理行为。

以往伦理决策模型认为伦理认知是个体伦理行为的起点，即个体首先要意识到其是否是一个伦理问题。本研究认为除此之外，对个人损益即得失的认知也可能是伦理决策和行为的起点，个体对个人物质损益(如金钱)、地位损益(如面子)和情绪损益的认知将激发个体不当得利、不当避损(害)、情绪释放或感觉寻求等非伦理决策和行为动机。而不当得利和避损(害)动机将导致个体的工具性非伦理决策行为意图；情绪释放和感觉寻求将导致情绪性的非伦理决策行为意图。行为意图是个体行为的初始环节，在这一环节中若无个体内在因素或组织制度因素等制约，将可能引发个体的非伦理行为。在极为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若个体面临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其可能会做出相应的伦理或非伦理决策，实施相应的伦理或非伦理决策行为。如某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荣誉、地位与尊重，跳出原有社会阶层，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其可能会为了维持得之不易的社会地位，时刻警醒自己，要以伦理的方式行为，从而继续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他人的尊重与自身的荣誉。同样，若个体由于某些原因(如破产等)，出现了社会地位的下降，其一方面可能会为了重新获得原有的社会地位，挺而走险做出非伦理决策，实施非伦理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为心存怨恨，而对社会、他人实施报复性的非伦理行为。因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中国情境下，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实际损益与伦理行为存在负相关。

此外，前景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并且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那么依照前景理论，面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地位损益时，个体预期的伦理行为是否也会存在差异，即较之获得地位的提升，个体更愿意为避免地位下降而冒险做出非伦理行为。也就是说个体可能会为了避免失去荣誉、权力、地位与尊重而铤而走险实施非伦理行为，为此，可以提出下述研究假设：

假设 3：中国情境下，较之社会地位的提升，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的下降会导致更多的非伦理行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心在全国开展的社会基本状况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度的调查数据。该调查覆盖到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2个县(区),调查对象均为18岁以上、70岁以下人口。2010年共调查了城市居民11826人,删除在伦理行为得分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后形成的有效样本为6895人。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选取

伦理行为变量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在CGSS(2010)问卷中,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在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与工作相关的章程规则、遵守政府部门的规定、购买冒牌或山寨产品、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组织纪律、侵占他人利益上行为的发生程度来测量其伦理行为,被调查对象需要在5点量尺中进行选择,其中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本研究以被调查对象在上述7项与伦理行为有关的问题中的综合得分来表征被调查对象的伦理行为。在对两个反向计分题的得分进行转换后,个体得分越高表示其越倾向于伦理行为。采用主成分法对被调查对象在7项与伦理决策行为有关的问题回答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的数据适宜性检验表明该数据适宜做主成分分析(KOM值为0.841,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为0.000)。根据Kaiser准则(Kaiser, 1960^[17])研究选取了2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67.426%,基本上保留了原来7个指标的信息。以2个主成分能够解释方差的比例为权重,可构造出衡量被调查者伦理行为的指标 $ethical=0.5015Z_1+0.1728Z_2$,其中 Z_i 为公因子值, Z_i 的权重值为各主成分的解释方差。

2. 解释变量选取

从已有研究可见,影响伦理行为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8-20]:①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哲学或价值观、教育和工作经历、国籍、道德认识发展水平、心理控制源、马基雅维利主义、宗教信仰等;②组织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的伦理制度、伦理氛围/文化、组织奖惩、组织规模、组织结构、行业类型等;③道德强度因素:主要包括结果的可能大小、亲近性等方面;④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群体规范、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网络等。本研究主要基于CGSS(2010)问卷调

查的结果来考察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及其损益对伦理行为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得性,研究主要将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个体当前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变化、预期社会阶层变化作为解释变量。

在影响个体伦理行为的个体变量中,最常被提及的是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等。按照常规的处理方法,我们将性别、宗教信仰、失业状态视为虚变量,年龄视为连续变量。婚姻同样被视为虚变量加以对待,在分析中,研究引入了两个反应婚姻状态的虚变量——已婚状态和分居、离异或丧偶状态。同样,我们也用两个虚变量——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来表征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为了使得各变量的数值取值区间尽可能保持一致,本文以个人收入的对数替代个人收入变量。同时考虑到加入政党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政治面貌虚变量,各控制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研究采用三个变量表征被调查对象的社会地位:个人当前社会阶层、实际社会阶层变化和预期社会阶层变化。在测度个人当前社会阶层时,研究沿用了CGSS(2010)问卷中被调查对象对其目前所处社会阶层从1(最底层)到10(最顶层)的十个等级的判断。CGSS(2010)问卷中并未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对社会阶层变化的判断,但询问了被调查对象对自身10年前和10年后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实际和预期社会阶层变迁变量(详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表中给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矩阵。从表2中可见^①,平均而言我国城市居民对自身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判断为中等偏下,但比10年前略有上升,并且均较为乐观地认为10年后自身的社会阶层将有所上升。相关系数矩阵表明,城市居民个体的伦理行为与初等教育和社会地位变迁呈负相关,与高等教育、失业状态、收入、政治面貌和现有社会地位呈正相关。个体受教育程度越低,越有可能表现出非伦理决策行为,个体收入越高、政治面貌是党员,行为越伦理。同样,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城市居民,也更多表现出伦理行为,而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实际变化则与伦理行为呈负相关,即地位下降的个体更多表现出伦理行为,地位上升的个体反而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同样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预期变化也与伦

理行为呈负相关，即预期地位下降的个体更多地做出伦理行为，而预期地位上升的个体，则更多做出非伦理行为，为进一步弄清楚社会地位及其变化对个体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随后还将借助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 假设检验

1. 均值比较

处于十个不同社会阶层城市居民的伦理行为的平均得分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见，社会阶层越高，

个体的伦理行为得分越高，相反，个体的社会阶层越低，其伦理行为得分越低，即更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进一步对上述 10 个社会阶层个体的伦理行为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阶层间存在显著的差异($F=5.595$ ， $P<0.01$)。

为进一步比较当前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城市居民在伦理行为上体现出的差异性，研究依据个体社会阶层评价结果对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了类型划分。将社会阶层自评得分为 1~3 的，划分为组一，即低社会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ethical	伦理行为	$Ethical=0.5015Z_1+0.1728Z_2$
控制变量	gender	性别	被调查对象为男性赋值为 1，女性为 0
	age	年龄	被调查对象的年龄
	religion	宗教信仰	被调查对象信仰宗教赋值为 1，其他为 0
	edu1	初等教育	被调查对象接受的教育水平为初等及以下赋值为 1，其他为 0
	edu2	高等教育	被调查对象接受的教育水平为高等及以上赋值为 1，其他为 0
	nojob	失业	被调查对象处于失业状况赋值为 1，其他为 0
	income	收入	被调查对象实际收入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polevel	政治面貌	被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赋值为 1，其他为 0
考察变量	clnow	当前社会阶层	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目前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以 10 分计，1 分代表对底层，10 分代表最顶层
	clchange	实际社会阶层变化	被调查对象社会阶层的变化=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目前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被调查对象对自身 10 年前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
	clfutue	预期社会阶层变化	被调查对象预期社会阶层的变化=被调查对象对自身 10 年后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目前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i>n</i>	$\bar{x} \pm s$	<i>r</i>										
			gender	age	religion	edu1	edu2	nojob	income	polevel	clnow	clchange	clfutue
ethical	6 895	0.000±0.530	-0.011	0.137***	0.005	-0.039***	0.046***	0.053***	0.071***	0.102***	0.069***	-0.040***	-0.069***
gender	7 199	0.470±0.499	1										
age	7 199	4.700±3.648	0.012	1									
religion	7 184	0.130±0.333	-0.063***	0.029**	1								
edu1	7 195	0.221±0.415	-0.114***	0.355***	0.118***	1							
edu2	7 195	0.241±0.428	0.077***	-0.301***	-0.089***	-0.300***	1						
nojob	7 188	0.364±0.481	-0.141***	0.500***	0.017	0.184***	-0.227***	1					
income	5 391	4.212±0.446	0.213***	-0.133***	-0.097***	-0.334***	0.439***	-0.131***	1				
polevel	7 191	0.165±0.372	0.188***	0.133***	-0.094***	-0.145***	0.287***	0.008	0.258***	1			
clnow	7 199	4.177±1.758	-0.012	-0.037***	0.015	-0.088***	0.181***	-0.030*	0.292***	0.133***	1		
clchange	7 199	0.518±1.671	-0.022	-0.141***	0.022	0.054***	0.043**	-0.111***	0.053***	-0.010	0.351***	1	
clfutue	7 173	0.953±1.766	0.010	-0.415***	0.047***	-0.089***	0.072**	-0.029***	-0.041***	-0.107***	-0.068***	0.203***	1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3 不同社会阶层个体伦理决策行为得分

clnow	n	Mean	Std.	Minimu	Maximu
1.00	635	-0.035	0.579	-3.61	0.49
2.00	566	-0.030	0.518	-1.75	0.49
3.00	1013	-0.021	0.519	-1.72	0.49
4.00	1175	-0.042	0.537	-2.69	0.49
5.00	2236	0.018	0.523	-3.61	0.49
6.00	800	0.011	0.541	-2.02	0.49
7.00	268	0.071	0.5124	-2.80	0.49
8.00	124	0.183	0.438	-1.48	0.49
9.00	24	0.129	0.454	-0.83	0.49
10.00	30	0.346	0.257	-0.75	0.49

地位组($n=2214$);将社会阶层自评得分为8~10的,划分为组二,即高社会地位组($n=178$)。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调查对象在伦理行为上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高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与低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在伦理行为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t=6.898$, $p<0.01$),高社会地位者比低社会地位者更多实施伦理行为。假设1得证。

2. 回归分析

描述性统计中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性别($r=-0.011$, $p>0.05$)和宗教($r=0.005$, $p>0.05$)与伦理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详见表2)。因此,这两个变量将不会纳入随后的OLS分层回归分析之中。

中国城市居民伦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以伦理行为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共检验了四个模型:模型一仅包括了可能影响个体伦理行为的控制变量,如年龄、教育程度、失业等;模型二则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当前社会阶层变量;模型三则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社会阶层变化变量;模型四则将可能影响个体伦理行为的控制变量、个体当前社会阶层、个体实际社会阶层变化和个体预期社会阶层变化均包含在内;从表4可见,如果仅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一),回归模型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调整后的 R^2 较低($F=25.767$, $p<0.05$, $R^2=0.028$)。当增加研究考察的变量——个体当前社会阶层之后,模型二在保持显著性的同时($F=22.971$, $p<0.05$, $R^2=0.029$),解释的变异也达到了0.1的显著性水平,但增长幅度并不大($\Delta R^2=0.001$, $p<0.10$)。同样,在增加了个体实际社会阶层变化变量以后,模型三仍然保持显著($F=20.806$, $p<0.05$,

$R^2=0.030$),并且模型解释的变异也有了一定的提高($\Delta R^2=0.001$, $p<0.10$)。但在增加了个体预期社会阶层变化变量后,模型四虽然仍维持显著,但模型解释的变异并没有提高($F=18.817$, $p<0.05$, $R^2=0.030$, $\Delta R^2=0.000$)。

表4 个体非伦理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age	0.149**	0.148**	0.144**	0.143**
edu1	-0.041**	-0.042**	-0.038*	-0.039*
edu2	0.042**	0.039*	0.038*	0.39*
nojob	0.011	0.010	0.008	0.008
income	0.043**	0.035*	0.034*	0.030*
polevel	0.039**	0.036*	0.036*	0.035**
clnow		0.035*	0.049**	0.057**
clchange			-0.035*	-0.037**
clfuture				-0.002
调整后的	0.028	0.029	0.030	0.030
ΔR^2		0.001*	0.001*	0.000
F统计量	25.767**	22.971**	20.806**	18.817**
N	5 182	5 182	5 182	5 182

注:表格中报告的为标准化回归系数(β);**表示 $p<0.05$,*表示 $p<0.10$

进一步分析四个回归模型可见: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面貌对中国城市居民伦理行为均有显著的影响,越年长的城市居民越倾向于实施伦理行为;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表现出伦理行为,反之,则更易表现出非伦理行为;个体收入越高,也越倾向于表现出伦理行为,而政治面貌是党员的个体较之非党员也更加倾向于实施伦理行为。但研究并未发现失业与伦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其在四个回归模型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对于本研究重点考察的三个解释变量:当前社会阶层、实际社会阶层变化和预期社会阶层变化,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体当前社会地位对伦理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便引入社会阶层变化变量后,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仍然显著($\beta=0.057$, $p<0.05$),假设1再次得证。

但回归分析的结果却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的变迁与伦理行为呈负相关,社会阶层上升的个体反倒更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社会阶层下降的个体则更多地表现出伦理行为,假设2并未得证。此外,模

型四的分析结果表明预期的社会阶层变化对中国城市居民的伦理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考虑到该结果可能会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研究将继续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比较预期社会地位变高和变低的城市居民在伦理行为得分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依据个体预期社会阶层变化得分对个体进行了分类，将预期社会阶层得分为正的，划分为组一，即预期社会地位上升组($n=3991$)；将预期社会阶层得分为负的，划分为组二，即预期社会地位下降组($n=541$)。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预期社会地位上升的居民与预期社会地位下降者在伦理行为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t=-3.840$, $p<0.01$)，后者反倒比前者更多实施伦理行为。假设 3 未能得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其代表着社会成员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但以往有关伦理行为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将社会地位考虑在内。本文以 CGSS(2010)中的城市居民数据为样本，考察了社会地位及其实际损益和预期损益对中国城市居民伦理行为的影响。中国情境下，研究发现：①高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较之低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更多实施伦理行为。②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损益与伦理行为存在负相关，现有社会地位上升的城市居民更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而现有社会地位下降的城市居民则更多表现出伦理行为。③较之预期社会地位的下降，预期个体社会地位提升的城市居民更多表现出非伦理行为。

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可见，中国情境下高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较之低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更多表现出伦理行为。这与预期的研究假设一致，但却不同于国外的研究结论。^[4-5, 15]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的重视有关。在中国，有德行的人，往往容易获得人们的尊重，有着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加上中国人固有的强烈面子观，对于处于较高社会阶层，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而言，为了保存面子，维护个人的荣誉，可能也不会轻易实施非伦理行为。

但本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假设：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实际损益与伦理行为存在正相关；较之社会地位的下降，个体社会地位的下降会导致更多的非伦理行为，均没有得到证明。恰恰相反，本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出现下降的个体反倒更多实施伦理行

为，相反，社会地位上升的城市居民却相对而言，较少表现出伦理行为；同样，预期个体社会地位下降的城市居民也更多表现出伦理而不是非伦理行为，相反，预期个体社会地位上升的城市居民却也更多地表现出非伦理行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阵痛有关。^[21]从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开始，我国进入了革故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原有道德约束体系逐步消解，新的体系还在建构形成之中，社会公众承受着因二者的冲突撕扯而带来的种种不安，容易产生焦虑、功利、浮躁、极端的社会心态，导致不同程度的权力失控、规范失灵、道德失范、社会失序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部分城市居民通过打道德擦边球，利用伦理道德体系的不完善获得个人的财富、荣誉和地位，因此当这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后，其会继续实施非伦理行为，因为这样会给他们带来收益。^[15]而高社会地位群体同一性会导致对群体外成员需求的不敏感，这反过来会导致更少的自我约束的伦理决策动机，从而使得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会更加愿意卷入非伦理行动。而对于社会地位下降或者预期自身社会地位将下降的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可能会因为长久以来的自律习惯或者为了维护尊严，希望继续得到原有高社会地位群体的认同，重新回到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以伦理的方式行为。也可能因为遭受了或者即将遭受财富、名誉等损失，反倒变得更加自律，更加愿意遵守社会道德约束，以便得以维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继续下降，或者仅仅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因而更加谨小慎微，从而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伦理行为。

当然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调查数据，其俘获的是同一时点的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寻找社会地位损益和个体伦理行为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带来了困难，今后可以考虑采取实验法，通过控制个体社会地位的实际损益和预计损益，探讨其对个体伦理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CGSS 中用于测量个体伦理行为的题项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其属于较为广义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较少涉及某种具体的伦理行为，如职场伦理行为。今后可以考虑直接在工作场所进行调查或者实施现场实验，探讨社会地位损益对工作场所个体伦理行为的影响。

注释：

- ① 由于被解释变量“伦理行为”已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故无法以标准化后的变量平均数说明城市居民伦理行为的现状，但从最初的 7 项有关伦理行为的得分平均数(4.54 ± 0.42)可见，城市居民伦理行为的得分较高，已接近最高分值 5 分。

参考文献:

- [1] Wang L, Murnighan J K, Money, Emotions, and Ethics Across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25(1): 163-176.
- [2] Treviño L K, den Nieuwenboer N, Kish-Gephart J J. (Un) Ethical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4, 65(1): 635-660.
- [3] 波谱诺. 社会学[M]. 李强,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68.
- [4] Piff P K, Kraus M, Côté S.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9(5), 771-784.
- [5] Piff P K, Stancato D M, Côté S.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11): 4086-4091.
- [6] Trautmann S T, Kuilen G V D, Zeckhauser R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Social Class and (Un) Ethical Behavior: A Framework, With Evidence from a Large Population Sample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8: 487-497.
- [7] Kahneman D, Tversky A.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8] Thye S R. A Status Value Theory of Power in Exchange Relation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 407-432.
- [9] 于铁山.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 CLDS (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社会*, 2015, 31(1): 89-97.
- [10] 曹大宇. 阶层分化、社会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考量[J]. *统计与决策*, 2009(10): 89-91.
- [11] 万斌, 章秀英. 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路径[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2): 178-188.
- [12] 赵延东.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2): 86-92.
- [13] Jones T M.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2): 366-395.
- [14] Rest J R.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 [15] Galperin B L, Bennett R J, Aquino K. Statu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rotean Self: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Unethical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8(3): 407-424.
- [16] 曾伏娥. 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形成机理及决策过程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 [17] Kaiser H F. Directional statistical decision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0, 67(3): 160-167.
- [18] Kish-Gephart J J, Harrison D A, Treviño L K. Bad apples, bad cases, and bad barrels: Meta-analytic evidence about sources of unethical decisions at work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1): 1-31.
- [19] Craft J L.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iterature: 2004-2011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7(2): 221-259.
- [20] Lehnert K, Park Yung-hwal, Singh N. Research Note and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iterature: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Extens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9(1): 195-219.
- [21] 秦强. 以制度对冲转型期道德阵痛[N]. *人民日报*, 2014-07-1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itizens' individual social status and their ethical behaviors

WU Ru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 the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real and expected gains and losses of social status on the ethical behaviors of Chinese citize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itizens with high social status conduct more ethical behaviors than those with low social status. Second, the real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citizen's social status have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ethical behaviors, the one whose social status went up do more unethical behaviors, and those whose social status went down do more ethical behaviors. Third, the citizens who expected an ascending social status will do more unethical behaviors than those who expected a descending one.

Key Words: social status; vicissitude of the status; ethical behaviors

[编辑: 胡兴华]